

「蔣中正總統九記」

時記

國史館
世界大同文創股份有限公司

— 蔣中正總統五記 —

時記

國史館

世界大同文創股份有限公司

【蔣中正總統五記】

蔣記

發行人：呂芳上

總策畫：何智霖

編輯：黃自進、潘光哲

出版機關：國史館

地址：臺北市中正區長沙街一段2號

電話：02-2316-1000

郵撥帳號：15195213

出版者：世界大同文創股份有限公司（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協助出版）

地址：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段15號2樓

電話：02-2357-5890

郵撥帳號：50250211

華南銀行儲蓄分行：101100065942

承印者：長達印刷有限公司

地址：臺北市西園路二段50巷4弄21號

電話：02-2304-0488

出版時間：2011年12月初版一刷

2013年4月初版二刷

2014年9月初版三刷

定價：每套新臺幣1,700元

GPN：1010004084

ISBN：978-986-03-0439-8（全套：平裝）

欲利用本書全部或內容者，須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書面授權。

請電洽本館秘書處秘書科，電話：（02）2316-1062。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蔣中正總統五記 / 黃自進, 潘光哲編. -- 初版. --

臺北市：國史館，2011.12

冊； 公分

ISBN 978-986-03-0439-8（全套：平裝）

1. 蔣中正 2. 傳記 3. 中華民國史

005.32

100025142

序

日記本屬個人生活方式的記錄，是「我之歷史」，但不能沒有社會性——涉及他人、他事的記載，日記歷史文獻價值因此存在，故就歷史研究言之，史家早就視日記為史料之一種重要形式。清季以降，士紳大夫、知識份子寫日記者多，日記創作風氣鼎盛。日記固屬私人，但頗多日記出諸官紳，所記內容，自不僅止於私密之內心世界，實多有涉軍國大事要聞者，於是日記又成為認識公眾歷史的重要史料。日記既有公私之記載，也因此能打破正史之文獻表述與壟斷。

「日記學」在近代史學研究中，不能不為史學界所看重。

近人陳左高、鄒振環關注日記本身的歷史發展，論述日記性質及史料價值者，多有可採。日記之類別，自外在形式言即可歸納至十數種之多，例如《張元濟日記》屬記事備忘日記，雲山樵《鎖闥日記》屬工作日記，李慈銘《越縕堂

日記》、《黃侃日記》、《竺可楨日記》屬學術考據日記，金滿慈《參禪日記》、孫奇逢《孫徵君日譜錄存》列宗教人生日記，《徐霞客游記》、王韜《扶桑游記》、郭嵩燾、劉錫鴻、張德彝、薛福成、曾紀澤、戴鴻慈等之「星輶日記」，均可列入游歷使行日記，胡適早年留學日記、《宋教仁日記》屬求學日記，《陳公博獄中日記》、《周佛海日記》則為囚亡日記，《吳宓日記》或可看作感情生活日記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實際上，多半日記具有綜合性質，難作硬性分類。

文化史家柳詒徵謂：「國史有日歷，私家有日記，一也。日歷詳一國之事，舉其大而略其細；日記則洪纖畢包，無定格，而一身一家一地一國之真史具焉，讀之視日歷有味，且有補於史學。」正因日記內容「洪纖畢包」，材料廣泛，如記載時間拉長，固為日後歷史留下大量線索，提供歷史研究絕佳素材，同時是執筆者記錄當下作為自行修身、事後檢討反思的依據，此即宋明理學家「自勘」、「回勘」的工夫，曾國藩的日記，蔣中正寫日記，均寓此意。

二

長期記錄的日記，其內容還可依性質、型式進行分

類。日記屬私密性文書，但有些日記在體制上需公開，如晚清使臣的「星輶日記」不只需上呈，且得正式刊行；有些記日記初衷是為公開，李慈銘《越縕堂日記》、胡適的日記屬之。理學家講究反身內省，日記用作修練工夫，但也不無道德示範作用，如曾國藩日記。蔣中正十分景仰曾國藩，由內省修身到行為政事，都有曾的影子，記日記更是其中一例。曾國藩日記由門人加以分類抄出、傳觀閱看，用以仿效督促。蔣記日記在生前即囑秘書作分類工夫，「九記」、「五記」及「事略稿本」均有自省及建立形象作用。

蔣中正日記有手稿本、仿抄本、分類抄本和引錄本等類型。手稿本自民國六年（1917）至民國六十一年（1972），共六十六冊，現存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，已全部公開，釋文本正計畫出版中。仿抄本就日記原稿依原有格式和內容重抄，作為副本，以防遺失，部分（1933、1934）藏於南京二檔館，多數隨手稿本存於胡佛研究所；引錄本見諸毛思誠《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》，孫詒、王宇高、袁惠常，人稱奉化三先生者，主編之《事略稿本》、秦孝儀《先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》及古屋奎二《蔣總統秘錄》等書，是蔣日記還未公開之前，史家淘沙撿金的對象。至於「五記」，可說是「分類抄本」的主體。

1920及30年代，蔣中正的私塾教師，後為秘書的毛思誠（勉廬）曾最早為蔣編修年譜，在年譜初稿編纂的同時，完成《自反錄》六卷（1931）、「日記類抄」（1919-1931）九類，凡二十六萬字。《自反錄》集文牘書翰而成，顧名思義，近於理學家的修身參考。現藏於南京二檔館，文革後倖存的「日記類抄」，對日記作九種分類摘抄，可名之曰「九記」。以「政治類」、「軍務類」為主體，屬公務活動記錄，部分已發表於《民國檔案》（1998-1999）；「學行類」、「家庭類」對個人思想活動與家事感情，多有直言不諱者，但亦不無刪節，內容很富可讀性；「文事類」、「身體類」，記讀書、寫作與身體健康狀況；「旅遊類」、「氣候類」，則為休閒與日常生活客觀、感性記載；「雜俎類」屬不入專類之其他記錄。蔣個人對此一抄本，常加審閱，民國二十二年（1933）四月十日「日記」謂：讀日記類抄學行類，「自覺有益也」。就毛思誠編纂年譜的過程言，日記類抄實際上是年譜的粗料、素材，故有一事兩抄情形。當其引入年譜時，在文字上有增刪與潤飾，而在選編時也不無主觀的取捨，故收錄機械性的天候，卻忽略後世學者看重的社會記事與自警修身詞語，便不足奇。不過，分類抄本內容，則均忠實於日記原本。

由日記衍生的另一種類抄本，為國史館所庋藏的《蔣中正總統檔案》——「五記」。抗戰時期，陳布雷主持「事略稿本」編纂工作，蔣同時命奉化同鄉王宇高（塘伯）、王宇正（垣叔）繼續依照「九記」模式輯錄日記內容，概分為五類，可名為「五記」。各記中摘錄內容重點與起迄時間不一，民國七年（1918）之前參照相關文獻及日後之追述輯入，之後依日記摘抄為多。行文大體依年、月、日劃分，以事相從，就日記之記載以第三人稱敘述，用「曰」、「公曰」、「自記」、「記曰」等引述日記文字，但取其精簡，故文字不必與日記全然雷同，雖有潤飾，仍不失日記之真。

「困勉記」（1902-1943）記述蔣處理黨政事務之心跡，82卷分上下冊，數量最多；「游記」（1892-1943）14卷，為日記中之游記；「學記」（1892-1943）32卷，為日記中之讀書心得；「省克記」（1915-1943）24卷，來自日記中「雪恥」欄自省、自勵、克己修身之語；「愛記」（1897-1943）30卷，為日記中對家人、師友、同志關愛之情與人際關係。如將「五記」與《事略稿本》比較，除起迄年份不同外，《事略稿本》以政治、軍事為主，於旅游、讀書、反省、感情之記述較為簡略，「五記」則包融更多更廣，尤可作為個人私領域與心態史研究之憑藉。相對的，「五記」文

字較為精簡，錄存日記外之文獻稍少，如能與《事略稿本》互參，確於研究蔣行事風格、德行事業，有互補有無，認識更為周全的作用。以日記為主體，衍生出不同類型的版本，內容不免有取捨不同，品人論事可能輕重不一，而這正是「日記學」有趣的課題。

三

「五記」既係就日記內容分類摘錄編輯而成，不過摘錄的內容，並非原文照抄，而是有所潤飾或增刪，有些則不見於日記原本，而是引錄自其他史料。以民國十五年（1926）三月的中山艦事件為例。日記原本的記載為：

〔十九日〕上午，往訪季新兄。回寓會客。準備回汕休養，而乃對方設法陷害，必欲使我無地自容，不勝憤恨。下午五時，行至半途，自思為何必欲私行，予人口實，志氣何存！故決回寓，犧牲個人一切以救黨國也，否則國粹盡矣。晚終夜議事。四時往經理處，下令鎮壓中山艦陰謀，以其欲陷我也。權利可以放棄，責任豈可放棄乎？名位可以不顧，氣節豈可喪失乎？故決心不走。

「困勉記」卷三的記載則為：

十九日上午，訪汪兆銘晤談。午，得〔李〕之龍電話：「中山艦可否開回廣州？」公始知其擅泊黃埔一夜矣，因問：「奉誰人命令？」答曰：「教育長鄧演達命令。」又曰：「校長命令。」公曰：「拿命令來看！」答：「是電話。」公因思之龍嘗自稱為共產黨員，乃大駭異。晚，聞之龍又擅開中山艦至省城，戒備甚嚴；又聞之龍受俄顧問季山嘉之命，欲劫公至海參崴，公乃與幹部密議，曰：「共產黨挑撥離間，與其買空賣空之卑劣行動，其欲陷害本黨，篡奪革命之心，早已路人皆知；若不於此當機立斷，何以救黨？何以自救？余決心犧牲個人，不顧一切，誓報黨國！」又曰：「權利可以糞土，責任豈可放棄乎？生命可以犧牲，主義豈可敝屣乎？此時再不決心，尚待何時？若不殉黨，何顏立世？直前奮鬥而已！」乃決定下定變各令。

兩者互參，日記簡略，「困勉記」較為詳實。而「困勉記」所引錄之史實，則出自《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》三月十九日之記載，及三月二十二日晚蔣回軍校召集官佐學生訓講之節錄。

再者，「五記」內容雖是摘錄自日記，但在分類摘抄時，字句難免有所不同。以抗戰時期陳誠與李宗仁之摩擦為

例，「困勉記」卷七十四之記載爲：

〔民國三十一年九月〕八日，與李宗仁談已，曰：

「陳辭修只知愛譽，而不知受人包圍，以致與德鄰感情不良，關於鄂省府應撥之軍糧與鄂東人事問題，更起摩擦，應設法調整之。」

「愛記」卷二十五之記載則作：

〔民國三十一年九月〕八日，曰：「陳辭修與李德鄰感情不良，關於鄂省府應撥之軍糧與鄂東人事問題，更起摩擦，此乃辭修受人包圍之故，應設法調整之。」

兩相比較，內容幾乎相同，所異者史實之因果關係對調而已。

復次，「五記」係以編年體方式記載，因此如能將前後史實相互排比，並參照相關文獻，當可見史事之原委。茲試以抗戰時期蔣對陳誠之期許與規勸爲例。抗戰初起，七月底平津失陷，蔣曾感嘆，大小事情無人能代爲分憂解勞。八月三日，陳誠電蔣建議四事：（一）對敵作戰應有一貫方針，明確步驟，整個計畫；（二）當前急務：1.健全統率機構，可用大本營名義；2.慎選將領，應爲事擇人，不能因人設事；3.任人課責，應以專一爲主；4.兼職人員之本職，應明令派代。（三）推進整個國防經濟建設，集中人力財

力；（四）北平爲八百年故都，應不顧重大犧牲以克復之。

因此，蔣於四日日記說：「軍事能代研究者，辭修也。」

（「愛記」卷十三）三十一年一月十八日，蔣以便餐方式召見陳誠，並徵詢他出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的意願，陳誠當即答以個人出處取決於革命需要與蔣的命令。蔣於當日日記記載道：「甚喜其進步之頗速而實也。」（「愛記」卷二十三）十月十二日，即前述陳誠與李宗仁摩擦之後，蔣召見陳誠談糧食與預算問題，蔣於日記中說：「今日與陳辭修詳談，訓勉其言語不可學官僚政客之圓滑方式，而辭修能領悟，可喜也！」（「愛記」卷二十六）十八日，蔣再度召見陳誠，稱許其所呈〈法令何以不能推行〉及〈穩定物價建議書〉，日記則記載道：「今日辭修來談，見其平心靜氣，甚有進步，可喜之至！」（「愛記」卷二十六）前後對照，不僅頗見其趣，亦能對史事有進一步瞭解。

以上簡單舉出三例，適足以說明「五記」之史料價值。

四

《蔣中正總統五記》的出版，應是民國史研究的一大盛事。衆所周知，蔣中正個人的歷史是近代國家歷史的重要

部分，《五記》摘取蔣中正日記精華，披露其個人性格、家庭生活、讀書游歷、感情故事、交友應酬、社會觀感、國之大事等種種公私紀錄。提供的訊息，足作蔣一生個人行止、近百年國家走向的重要參考資料。

民國八十四年（1995）國史館奉命接管《蔣中正總統檔案》（大溪檔案），這批近三十萬件重要史料，兩年後全部正式開放；九十二年（2003）陸續出版大部頭的《事略稿本》八十二冊；一百年（2011）更推出《五記》。十數年來，國史館推動「蔣（中正）學」的研究，可謂不遺餘力。近年中國大陸學者「蔣公」朗朗上口，「民國熱」紅遍神州大地，這是時代趨勢使然。如稱國史館為民國史重鎮之一及「蔣學」的學術研究一大推手，實不遑多讓，也當之無愧。

日記為近代史學研究的豐富寶藏，從形成、保管、自勘、回勘、分類、編纂、出版到研究，蔣中正日記可稱「日記學」研究的絕好範例。通過日記文獻而發掘歷史底蘊是日記學的任務，《五記》的出版，實涉及文獻版本學、分類學、校勘學諸課題。從日記的形成到出版、解讀，蔣日記穿梭半個世紀，足跨公私領域，迴盪於傳統與現代之間，讀來尤其教人興味盎然。

「學術乃天下之公器」、「學術無禁區」、「人民有

知的權利」，這是臺灣學界傲人的宣示。歷史縝密的研究植基於寬廣的架構上，才具意義，相對的說，歷史意義來自寬廣的視野和架構上的縝密研究，其基礎全在豐厚的史料。蔣中正日記的公開、《事略稿本》、《五記》的出版，讓學者從資料的積澱、勘磨、耙梳中作出研究成果，讓人們還原歷史、認識民國，讓歷史人物活在歷史現場，讓「人」的歷史因而重現。學界期待在此，國史館的用心亦在於此。

國史館館長  謹識

民國一〇〇年十二月十二日

導 論

潘光哲^{*}、黃自進^{**}

一、前 言

身為二十世紀中國／臺灣最重要也最具爭議性的領袖人物之一，蔣中正（1887-1975）的政治遺產，豐富多樣。然而，由於眾所周知的因素，對於蔣中正的評價，始終陷於意識形態泥淖，蔣中正斯人斯事及其政治遺產，遂難可獲得全面精緻且恰如其分的理解。

史料的整理纂輯，實即史學工作者的本務之一。這部《蔣中正總統五記》的編輯、整理與出版，即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「蔣介石研究群」（以下簡稱「蔣介石研究群」）的階段性成果之一。本書的紀錄，或有光照一隅之偏，必須與蔣中正遺留的其他史料相互參照，仍是意蘊豐瞻，應可為研究蔣中正與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，提供面向多重的史料；但願本書的出版，對於「蔣中正研究」這個學術領域的發展，確可供應片磚寸瓦的助益。

^{*} 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兼胡適紀念館主任。

^{**} 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「蔣介石研究群」召集人。